

神农城迹

SHENNONG CHENGJI



衡山上龙珠的纪念亭——烈光亭



龙伯坚(名毓莹,伯坚其字也)藏书印

攸县横山龙氏家族曾有这三幅字:一幅是中国革命之父孙中山先生题的“博爱”,一幅是革命先驱黄兴写的“无我”,一幅是伟大领袖毛泽东的手记。

考诸史籍,这三位在中国革命史上响当当的人物都与攸县横山的龙氏

家族的佼佼者龙璋、龙峻瑞和龙伯坚有过交集。这三幅题字记载了发生在他们之间荡气回肠的热血故事,也记载着一个家族的百年沉浮,一个民族的百年荣辱,更记载着每一个中华儿女的赤子之心。

1

中国共产党诞生前夕,山河破碎,生灵涂炭。一批批仁人志士前仆后继,挺身救国。出生官宦世家的龙璋,祖上都是朝廷重臣,叔父龙湛霖是光绪皇帝的老师。面对朝廷的无能,他深感国势积弱,毅然辞官回乡,开始创办学校和开办实业,走上“教育救国”、“实业救国”之路。他创办学校十多所,知名的有明德中学、周南女子学堂、湖南高等铁路学堂、南云商业学校等等。在家乡攸县就有他创办的南云商业学校的分校,为攸县培养了第一批商业人才。攸县东

山书院就是当年的南云学堂,所以今日的攸县一中中还有一栋楼称为南云楼。

龙璋深感中国的贫弱是因为太缺少现代的工商业,便把一腔“实业救国”的热血倾注于湖南早期的民营航运、矿业、工艺、瓷业等多个领域,一人分饰多角,摸索着为“没有前人做过的事”引路。作为一介书生,办实业失败难免。他说,“我之办实业是倡之于前,不论成败与否,只要继起有人,我也就满足了。”是的,他的目的就是为了抵制外商,振兴民族工业。

2

实业在湖南的兴起依然改变不了民族的衰败。龙璋深知,救国,唯有革命!1903年,黄兴从日本回国,以体育老师的身份在龙璋创办的明德学堂任教,以此为掩护成立“华兴会”,从而开启了中国内地革命的先声。可是枪支弹药没钱购买,龙璋冒着被杀头的危险,当即拿出一万块大洋资助。此后,龙璋殚精竭虑为革命筹款,只要革命有求,他总是慷慨解囊。据《湖南省人物志·龙璋传》记载,仅仅支持“华兴会”的经费,龙

璋就慷慨花掉了20万块大洋。没有人统计龙璋为革命到底付出了多少,只知道直到去世,他连一处住宅都没有给自己买下。此义举令孙中山先生无比动容,亲题了“博爱”二字相赠。

今天,在衡山的半山腰上,纪念龙璋的烈光亭岁月斑驳,掩映在青松之中,倒在山路上的石碑上还可以清晰辨出当年国民政府所下“毁家纾难,兴学育才,厥而屡兴,老而益壮”的《褒扬令》。

3

1904年8月底,“华兴会”准备起义,正隐藏在长沙西园北里的龙家地下室开会,因叛徒告密,官衙突然闯进来捉拿黄兴,龙璋迅速把黄兴藏在复壁之中,才幸免于难。安全抵达上海后,黄兴发了一封仅有一个“兴”字的电报,表明自己已经安全。这就是中国革命史上赫赫有名的“复壁藏黄”的故事,这个龙璋就是龙璋的八弟,明德学校的创始人之一。

一个从西园风暴中心走出来的龙氏家族子弟,龙家的精神根植在他心中。这个上世纪哈佛大学医科毕业的高材生并没有成为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两眼只读解剖学”的医学生。龙家的血统在召唤他:关心国家,投入社会。在那段白色恐怖的岁月里,在这个西园里,留下毛泽东和龙伯坚为《新湖南》探讨的身影,留下毛泽东为杨开慧病痛雨夜访的身影,留下龙伯坚不顾个人安危数次为苏区筹集药品的身影。一介书生龙伯坚和千千万万的共产党人一样,即使抛头颅、洒热血也在所不辞!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回首这一切,在给龙伯坚的回信中发出了“与有荣幸”的感慨。

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章士钊先生这样评价龙氏家族:“略洞庭而南,上下数千里间,吾党所为处心积虑,不论激随隐显,殆不莫有龙氏一门之心计与血汗渐渍其中。”

4

如果时间定格在1953年的3月15日,长沙西园北里这样一个场景会刻进所有湖南人的记忆——从长沙西园北里龙家走出来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这是两条绵延几里长的板车队,总共是300辆,装的全是箱笼大柜。

万册珍贵线装藏书连同300个古老的箱笼全部无偿捐献给湖南省图书馆。湖南省图书馆的管理员李全安同志后来回忆:五千年年文明史的中华古国,这也是开天辟地头一回啊!今天,盖着龙家“长沙龙毓莹夜楼藏书”印章的60万册线装古籍和300个古木箱笼静静地躺在湖南图书馆里,熠熠发光。

历史记下了这一时刻,这个让毛泽东感慨“与有荣幸”的龙伯坚把家里60

5

从上个世纪40年代开始,龙伯坚就下定决心要将《黄帝内经》的秘密解译出来,为此,他将大量的精力投入到《黄帝内经集解》一书的编撰工作。无论是八年抗战举家逃难,还是文革期间挨批挨斗;无论是避嫌横山老家、嵩山成弦山冲;无论是辗转贵阳、湘西,龙伯坚始终不忘《黄帝内经》。

两腿一伸去了,这个任务就完不成了,时间不多了,我能不拼命吗?”1983年4月,协和医院的病房里,双目已经失明的龙伯坚在去世前两个月终于用父子语录的方式完成了《黄帝内经集解》写作。

1983年6月26日,这位老人对紧贴在他身边的儿子龙式昭说:“昭儿,你理解爸爸的心,你是我们龙家新的顶梁柱了,坚强一些,书稿一定要坚持完成,决不放弃。”这个与20世纪同龄的老人眼前手里仍抚摸着那几尺高的文稿,哼着“渠渠夏屋,众力所成;块砖片瓦,分任无负。年力有限,此长征;尽我微薄,不负吾生!”

我们没办法想象集注这样一部伟巨著作的著作是一个怎样艰巨的工程。龙伯坚花了40多年,儿子龙式昭又花了20年校补才交付出版。

两代人,60春秋著一书只为华夏兴。我们无法估算这部巨著的价值,只知道巨著出版那一年全球轰动,全世界的权威医学报刊都在相继报道这一世纪工程。

6

今天,我们的民族以昂扬的姿态屹立世界。我们更不会忘记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情景。当年中国入世谈判首席代表叫龙永图,他是龙伯坚的堂侄。1986年,龙永图放弃在联合国的高薪,回国任职。历时15年,从青丝到白发,终于助力中国迈进了世贸组织的大门,赢得了世界的尊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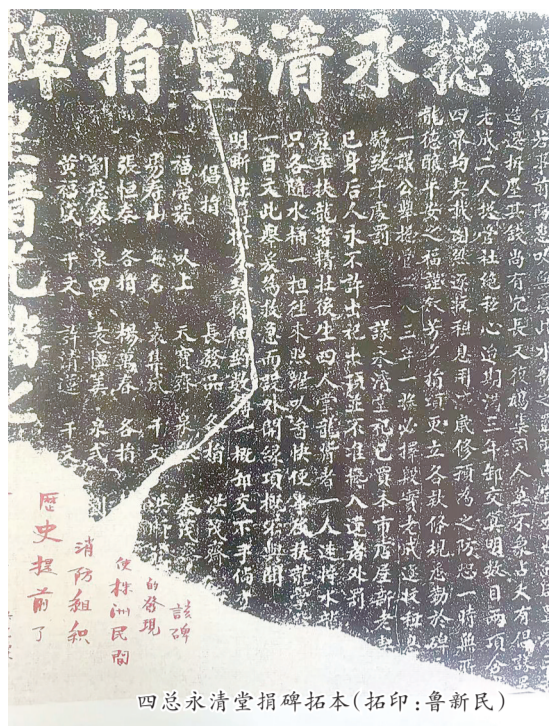
书再到龙永图在世贸叩开世界的大门,一个家族历经百年风云,与中华民族同呼吸共命运。龙璋的书房一直挂着王阳明的“一姓之存亡,私也;而生民之生死,公也。”这是一个家族已刻入骨髓的“无我”二字的注脚。

百年岁月,这个家族用“无我”二字和与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一起,为了中华民族能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而不遗余力、勇往直前!

从龙璋资助革命到龙伯坚艰难著

从龙璋到龙永图
攸县横山龙氏,一个「无我」家族的百年强国梦

龙平波



四总永清堂捐碑拓本(拓印:鲁新民)

- 碑名:四总永清堂捐碑
- 材质:大理石
- 规则:残存高67厘米、宽56厘米、厚11厘米
- 年代:清
- 现状:厝置于渌口伏波庙

碑刻里的株洲

四总永清堂捐碑
见证株洲最早的消防组织

郭亮

旧《醴陵县志》载,渌口“为本县(渌口旧属醴陵,编者注)之门户,水运出入孔道,凡属产货物,外来商品,鲜有不从此经过。”

货物堆积如山,商铺多为木制楼面,消防安全必然是重中之重。考诸史籍,我国早在黄帝时就设了专门管理用火安全的官员,称“火政”(见《史记·五帝本纪》)。不过,仅限于朝堂之上;北宋时期,我国开始有了官办的专职消防队,称军巡捕或防隅,主要任务是“夜间巡警”,督促居民按时熄灯,消防火灾隐患,火警起时,亦能有效配合,警戒弹压、救护居民、抢救财产、运水灭火等,各司其职,纹丝不乱。不过,这样组织严密、制度完善的专职消防队,只有京畿重地才可享有,在广袤的中国城乡各地,遇有火警,也只有临时组织人手扑救,效率自不能跟专业的消防组织相比。要建立专业高效的职业消防组织,不论在官在私,都要在之后的很多年才能出现,尤其是株洲这样远离行政枢纽的偏僻之地。

据《株洲市志·法治·消防》篇载,株洲近代最早的专业消防组织是民国22年(1933年)成立的株洲义勇消防分会,队员70名,这也是有史可稽的株洲地区最早的专业消防组织。而在渌口的伏波庙,藏有一块刊于清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的四总永清堂捐碑,残缺不全的碑文显示,迟至在光绪七年,渌口便成立了专职的消防组织,且制定严密的组织章程,这比市志中所载,株洲最早的近代专业消防组织至少提前了52年。

●绸缎铺子与消防组织

“一总工,二总谷,三至六总红绿布,七八总瓷器铺。”

上了年岁的老渌口人,大多对这一段顺口溜倒背如流,这是对旧时渌口老街商业布局的一个归纳总结。总,在旧时方言中有集市之称,起于湘潭,旧时湘潭老城区沿江老街每过一二里便有集市,当地人称之为“总”,有一总到十八总之多。渌口的老街也沿袭了这种称谓,自接龙桥为起点,沿渌江依次而下,直至渌江汇入湘江的关口河滨,也以一至八总为名。这一方面说明了渌口那时商贸业已很发达,另一方面也可见其时湘江两岸商业流通、文化融合已自然而普遍了。

藏在伏波庙中的这方石碑,既以“四总”为前缀,想来那永清堂自是绸缎铺子无疑。至于原址是否就在伏波庙所在的伏波岭,则只能暂时存疑。

绸缎铺在旧时属重资产行业,布料价值高,又易受火,消防自是重中之重。残缺的碑文显示,永清堂早在咸丰末年就已组建专业消防组织并增设消防设施——“此水龙之置,所由宜亟也”。可惜事不遂人愿,一直到刻碑的光绪七年,才算告成。“谨叙芳名捐项,更立各款条规,悉勒于碑。”之所以拖了二十余年之久,主要是场所不大好找,位置不能离永清堂太远,空间还不能小,得存放消防器材,还得留出消防队员的生活空间……

●“水龙”里的繁华

不管怎么说,专职的消防队总算是组建起来了。核员七名,“总管两人,三年

一换,必择殷实老成……”另“雇率扶老者,精壮后生四人”;还有“掌龙背者一人……”这里有必要对机动水泵等现代消防设施出现之前的救火工具做个普及:

据清人陆以湑《冷庐杂识》记,“救火之器,古惟水袋唧筒,顺治初,上海唐氏得水龙之制于倭人,久而他处渐传其制。”水袋是用马或牛的皮做成的,可以装三四百斤水,袋子绑起来,插进一根去节的竹子,水就可以通过这根竹子流出来,出现火险时,就由三五个壮丁抓着竹子借助袋口,向着火点注水;唧筒在清宫档案中又被称为“岔子激桶”,“筒是长竹,下开窍,以塞囊水杆,自旁吸水”,火情发生时,将唧筒立放在水缸里,提上套筒,水便吸入其腔,再压下套筒,水即从出口处射出,直射着火点,最大射程可达到20米;水龙则相当于唧筒的升级版,在唧筒原有的配置之外,增设了一套杠杆装置,操作更便捷,出水力更大,射程也更远,《远西奇器图说》评价水龙为“火力正胜,人不可近,但有此器,则五六人可代数百人之用,又不空费一滴之水,不拘多高、多远,皆可立到”,正可说明其优越性。

据《株洲市志·法治·消防》篇载,民国初期,境内灭火器主要是桶、盆、壶、罐等民用工具,到民国22年(1933),株洲义勇消防分会才添置两台手抬式打板机及唧筒若干;反观渌口,在清光绪七年就购置了彼时最先进的灭火工具水龙,字里行间留下的线索表明,这水龙须精壮后生四名扶龙并一人掌龙背,规模还不算小。两相对比,更可佐证渌口当年的富庶繁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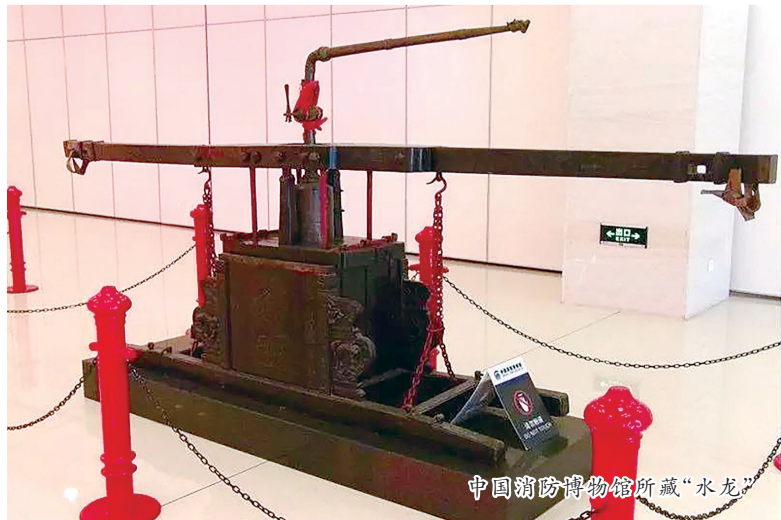
●严密的组织章程

碑文显示,由渌口四总永清堂倡捐设立的这支消防队伍,除总管两人外,余员均为全职,经费则来自于前置的产业——碑文有“逐收租息”句——只是,由于年代久远,碑文字迹多有漫漶,这前置的产业究竟若何如今已不清楚。

除了额定的工钱之外,每有救火之事,还有额外奖赏,“事后扶龙掌背……一百文(……为字迹漫漶处)。”也只有这样突发的状况才有额外的开销,“此举受为救急而设,外开缘项,概不兴闻。”当然,这样的额外开销也是须严格记录在案的,“明晰注簿,将各契、券、佃、约、数、簿一概卸交下手。”这也是总管其事者“必择殷实老成”的理由所在——殷实便不会贪小利、做花账,老成则练达,可保治下产业租息的按时收取,以备消防之需。

同样,根据权责对等之原则,碑文中也对违反相关条例者有“已身后人,永不许出祀”的处罚,剥夺己身及后人祭祀祖先的权利,这对宗法制度至上的旧时中国人来说,无疑宣布“社交性死亡”,只是由于文字多有不辨处,现在的我们已无从得知到底该是怎样的违规行为才有如此严重的后果。

碑文的最后,刊刻的是捐资人的名录,既有个人出资,亦有以店铺之名出资者,像福荣号、长发品、天宝斋、洪茂斋、洪断号这类。如是看来,这方碑文多有漫漶的石碑,不但将株洲地区的民间消防组织提前了至少52年,对研究清末民初渌口商铺名录亦是极珍贵的一手资料。



中国消防博物馆所藏“水龙”